

宿白 著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文物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

2011年1月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梁秋卉
责任编辑：张小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5010-3114-6

I. ①魏... II. ①宿... III. ①考古-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考古-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K8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626 号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宿白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6 开 印张: 27. 25
定价: 160. 00 元

目 录

一、城址·墓葬及其他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1986)	(3)
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 (1978)	(25)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1978)	(40)
隋唐城址类型初探 (提纲) (1990)	(63)
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察* (2001)	(70)
武威行* (1992)	(80)
宣化考古三题*	
——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里八辽墓群 (1998)	(97)
青州城考略 (1999)	(121)
太原北齐娄叡墓参观记 (1983)	(132)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札记 (1989)	(138)
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 (1995)	(148)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 (1982)	(160)
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 (1996)	(179)
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 (1986)	(186)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 (1986)	(194)
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 (1992)	(196)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 (1996)	(202)
三记拉萨大昭寺藏鎏金银壶	(206)

二、宗教遗迹

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

——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 (2004)	(211)
4 至 6 世纪中国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几次变化 (2005)	(224)
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 (1997)	(230)
隋代佛寺布局 (1997)	(248)

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2009）	（255）
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	（270）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参观记（2002）	（286）
西部大开发中维修和保护新疆石窟寺遗迹应注意事项*（2001）	（296）
有关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调查工作纪略	（302）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2010）	（307）
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1997）	（310）
青州龙兴寺沿革（1999）	（327）
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1999）	（333）
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事辑（2003）	（351）
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1985）	（361）
记新剥出的蓟县观音阁壁画（1972）	（376）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1999）	（379）
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1962）	（384）
永乐宫调查日记	
——附永乐宫大事年表（1963）	（395）
附录	
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1952）	（415）
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2003）	（421）
后记	（431）

子目后括号内数字，系该文稿原刊发表的年代（未列年代者即初刊于本《辑丛》）；又后附*号的子目，系《辑丛》录入时，对原刊校字较多或有部分增删的文稿。

一、城址·墓葬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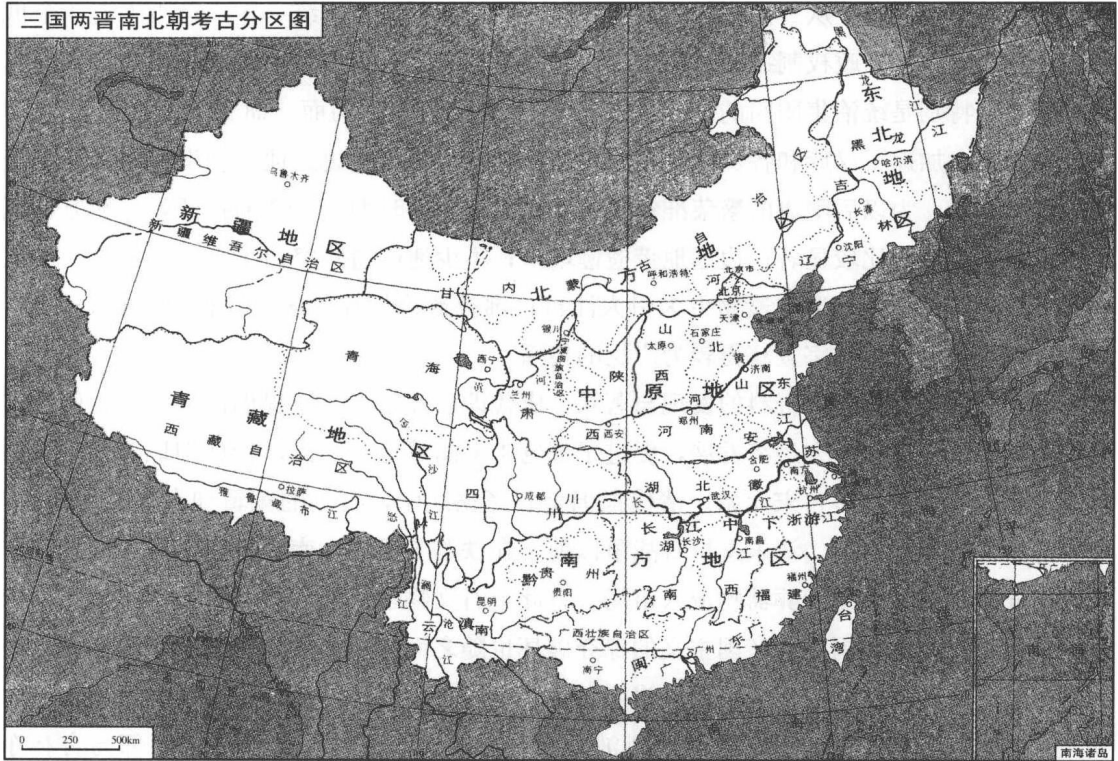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三国鼎峙起，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经历了近4个世纪。在此期间，若干政权割据的时间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和部分汉人的流动、迁徙，特别是统治集团间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边远地带和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隋唐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这时期考古学的特征是：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边远地带遗迹增多；不少遗迹遗物突出了军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绘得到发展，形象地说明这种外来的宗教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资料的发现与著录，唐代即已开始。北宋提倡恢复古礼，研讨古器物蔚成风气。宋元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都邑志书的纂修，因此，较详细地著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遗迹遗物，应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据之学，石刻的蒐辑和古器物的考订，规模广泛又驾宋元之上。清末迄抗日战争以前，在铁路工程中，南北各地发现了大批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大量随葬器物流入市场。自此金石文物学家的收藏与记述，脱出主要依靠历代传世遗物的范围；而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也随之而来。当时破坏最严重的地点，是河南洛阳一带和浙江绍兴地区，而以洛阳尤甚。帝国主义勾结奸商，十数年间洛阳附近北朝大家几无一不被盗掘。盗掘破坏之风波及江苏、山东、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与吉林东部。从19世纪末起，一些国家就纷纷派人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对各种遗迹、遗物，肆无忌惮地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劫夺和破坏。这种文物的外流和破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开始对重要遗迹进行实地调查，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敦煌石窟（1923年）和汉魏洛阳城遗址（192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32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丹阳地区六朝陵墓（1934～1935年）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宝山等石窟（1934～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调查河北南部响堂山石窟（1935年）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车师、高昌墓葬（1930年）和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发掘的魏晋墓葬（194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1951年中央文物局调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发掘雨花台吴晋墓群为开端。1953年以来，各地较普遍地发现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各种遗迹，也较普遍地对地上遗迹进行了勘测。1958年以后，逐渐开展整理研究工作，较有成绩的项目有：墓葬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城址布局的研究；边境地区遗迹遗物的讨论；中外文化交流遗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遗迹的研究等。

根据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采取分区组织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两个主要地区；北方和东北、新疆也都各具特点；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应另分一区，但因考古发现较少，个别遗址暂附北方地区（图一）。



图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分区图

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指南界淮河，北迄燕山，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这个区域内发现了大批墓葬，保存了一些重要城址和佛教遗迹。

墓葬 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依据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一般分魏西晋（即3世纪至4世纪初）、十六国迄北魏迁洛以前（即4世纪初至5世纪末）和北魏迁洛以后迄北齐北周（即5世纪末至6世纪80年代）三期。

第一期：魏墓发现较少，洛阳涧西16工区发现有前后室的砖墓一座，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为棺室；前室为方形，出有正始八年（247年）铭的一套铁帐架（帐构），前室左

右各设耳室，耳室内多贮陶器。该墓形制虽与东汉晚期墓相似，但出土器物如四横耳罐、陶灶和侍俑等已多似西晋墓，可能是一座接近西晋的晚期魏墓。西晋墓多发现在洛阳附近，今河北南部和北京地区也有不少发现。西晋时期有前后室的砖墓，如洛阳永宁二年（302年）尚书郎妻士孙松墓，但流行的是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随葬品有透雕铜扣、帷帐石趺、盘口壶、空柱盆、多子盒（桶）、酱釉小罐、陶牛车、镇墓兽、武士俑和男女侍俑；较大型墓中多出有竖置的墓志和金银饰品。

第二期：十六国迄北魏迁洛以前的墓葬发现较少，中原地区现知的地点，只有陕西西安和河南安阳。西安嘉里村方形单室洞室墓出有男女侍俑和陶牛车，与洛阳西晋墓接近；但西安草场坡发现的具前后室的洞室墓，随葬主要器物是80余件包括陶牛车、甲马的武装仪仗俑和20多件男女侍俑和女乐俑。大批陶俑随葬是这阶段较大墓葬的特点，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墓也具有这个特点。安阳则是另一类型，多为长方形土圜墓，随葬器物虽少，但多殉有马、犬等牲畜，有的墓还随葬全套的鎏金铜马具。研究者推测这类墓葬的主人，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人居黄河流域的鲜卑人。

第三期：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墓葬，发现地点较普遍。洛阳附近多北魏墓，河北临漳、磁县一带多东魏北齐墓，北齐墓另一个较集中的地区是山西太原及其附近，陕西汉中发现西魏墓，陕西华县、咸阳和宁夏固原曾发现北周墓。此外，许多地方发现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赞皇李氏墓群、山东临淄崔氏墓群等。这阶段墓葬可分大、中、小三型，大中型墓中只有极少数的前后双室砖墓，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的砖墓或洞室墓，也偶有平面略作圆形的。大型墓墓室和墓道两侧壁画原都绘有壁画。就残存的情况看，墓室壁画多分上下两栏，上栏画四神，下栏画车马，如洛阳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元义墓，墓道壁画上下栏绘墓主人出行与归来，如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叡墓，也有墓室墓道壁画都不分栏，只绘一列武装侍卫和侍女、女乐的，如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墓。大中型墓葬具附近出玉璜和各种珠饰的，表明墓主人原具朝服葬。其他随葬品仍以武装的仪仗和伎乐女侍俑为大宗，但数量种类都比以前更多，造型更加精美。瓷器和低温铅釉陶器日益增多。一种摹仿西方金属器上锤鏤花纹效果的堆塑贴花的装饰技法，在陶瓷器上流行起来。这种情形和这阶段墓中不断发现的西方货币、西方器物以及“胡人”形象陶俑等，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阶段出现了平置带盖的墓志，东汉树立在墓前的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墓地等作法，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洛阳涧河两岸发现成批的竖穴砖棺和竖穴洞室墓，这类小型墓面积窄小，一般不随葬陶俑，随葬品只有几件烧成温度低的陶器，有的有少量的永安五铢、常平五铢和永通万国等铜钱。

城址 中原地区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城址有魏邺城遗址、魏晋北魏的洛阳城址和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址。根据调查和试掘，结合文献记载，得知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都是利用东汉

旧城改建的。北魏洛阳不仅改建了魏晋洛阳，并在城外四面兴建了外罗城垣。东魏北齐邺南城则是参考了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并利用了魏邺城的南垣向南营建的新都城。魏晋改建邺城、洛阳，重点在集中宫苑衙署和加强西北隅的军事据点。北魏扩建洛阳城和东魏北齐新建邺南城，除了进一步利用旧有防御设施外，还扩大并规整了居民区（坊里），调整并对称地安排了工商业区（市），因而都城中人口集中和工商业发达这些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北魏洛阳和北齐时期的邺城都营建了众多的佛寺。有名的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已进行了发掘，北齐邺城的兴圣寺遗址也开始了勘查。

矿冶遗址 现已发现的冶铸遗迹，多分布在东距洛阳不远的晋南豫西地区。

山西运城洞沟铜矿矿洞有东汉光和二年（179年）、中平三年（185年）刻铭，紧接中平三年铭后有魏甘露纪年（256~259年）刻铭，可知此处铜矿到魏末仍在开采。因此，矿洞内发现的铁锤、铁钎等采矿工具和炼制的铜锭等遗物以及矿洞附近分布的冶炼遗址，都有可能是魏晋时代的遗迹。

在河南渑池车站南侧，涧河北岸，发现东汉迄北朝时期的铸铁作坊遗址，在其北面发现一处大约是北魏时期遗留的铁器窖藏。窖藏中共有铁器4195件，内铁范152件，器类60种以上。最多的是农具，其次是手工业工具和兵器。其中有近300件铸有产地铭文，较多的铭文具有魏晋字体的特征。经化验和研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钢制农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如528号“新安”镰和277号“龟□□”斧，是由白口铁铸件脱碳而得钢，并对刃口采取了渗碳硬化工艺；又如420号“新安”铍范，已接近现代高强度铸铁的低硅灰口铁铸件；还有257号“陵右”斧的釜部，发现了可以代替锻钢的类似现代球墨铸铁的球墨组织等。这类高水平的冶铸技术，虽然在汉代多已出现，但渑池窖藏进一步表明魏晋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改进和推广。冶铸技术的提高，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使传统的铜兵器绝大部分为铁兵器所代替。铁制身甲的完备与流行、马铠的使用等都出现在这时期，显然不是偶然的。魏晋完成三门峡人门左岸栈道和重修汉中褒斜栈道以及北魏大事兴建褒斜工程，还有北魏以来大规模开山凿窟和细密流畅的石刻线雕的盛行，更与当时大量生产锋锐的铁工具有密切关系。

佛教遗存 中原地区发现的佛教遗存，有零散造像和寺院遗迹。寺院遗迹可分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两种。

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佛教遗物，是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像。这种早期铜像都有较浓厚的中亚风貌，其中以有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的释迦坐像和传陕西三原出土的菩萨立像最具典型性。此后，现知有纪年的造像，已迟到北魏太武帝废佛（446年）前不久，有太平真君元年（440年）铭释迦铜坐像、太平真君三年铭菩萨石坐像和石塔以及四年铭释迦铜立像。上述诸像，与和平元年（460年）开凿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初期的作品接近。452年北魏复法以后，铜石造像同时流行，造型题材都与同时期的石窟相同；而石像形体

较大者多，尤引人注目。北魏迁洛（494年）后，特别在北魏分裂（535年）以后的北朝晚期，又流行造像碑。这时的造像和造像碑，在一些细部和雕刻技法上，都出现了地区差异。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关东作品精细繁缛，关中地区的作品则简朴、不重装饰。

十六国后期开始开凿石窟寺院，现存最早的石窟，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窟内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造像龕。此外，分布在自甘肃东部以东广大中原地区的石窟，大都开凿在5世纪中叶以后的北朝时期。主要石窟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甘肃庆阳南北石窟寺、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以上石窟，除麦积山多塑像和少许壁画外，多是石雕造像。中原地区的北朝石窟，可分佛殿窟和塔庙窟两类。两类石窟又可各分前后期，前期的年代是迁洛前后的北魏，后期为东西魏迄北齐、北周。前期佛殿窟，较早尚存有方形委角接近椭圆形的平面，如麦积山第74、78双窟和龙门宾阳三洞；较晚则流行龙门习见的三壁三龕式的方形窟。前期塔庙窟也以洛阳附近的巩县石窟为典型，特点是平基窟顶和多层或单层四面开龕的塔柱。晚期石窟盛行雕饰前室和窟口，佛殿窟流行雕出华丽的帐饰和仿木结构的窟檐，如麦积山第4窟（上七佛阁）。塔庙窟则在窟口崖面雕出上设覆钵的佛塔形象，如北响堂诸窟。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北响堂第1、2窟（南窟）。该窟上部覆钵部分开龕设像（即第1窟），下部窟室内（即第2窟）取消了塔庙窟的主要特征——塔柱，完全同于佛殿窟的布置。两类石窟前后期造像内容大体近似，主要题材有释迦、弥勒、释迦多宝、三佛、七佛、千佛等，前期较晚出现无量寿佛，后期出现面积较大的西方净土。无量寿和西方变的出现，反映出南朝佛教对中原的影响；前此比较重视禅观的北朝佛教，开始发生变化。

中原地区的佛寺遗迹，反映了北魏时期着重佛塔的寺院布局。河北定县城内发现太和五年（481年）塔基石函，函盖铭记孝文帝“造此五级佛图……愿国祚延茂（长），永享无穷……”可见当时重视佛塔的情况。对熙平元年（516年）胡太后所建洛阳永宁寺遗址的发掘，揭示出该寺平面呈长方形，有名的永宁寺塔位于寺院正中，塔北有佛殿遗迹。这是现知唯一的可以大体复原的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布局。此外，现存的北魏登封嵩岳寺塔，原也是当时该寺的重要建筑。佛寺特重佛塔，它与石窟寺院塔庙窟的设计为同一渊源，既上承汉末笮融在广陵起重楼浮屠祠的传统，又都属于尚未脱离外来佛寺布局影响的中国早期寺院布局阶段。

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即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考古遗迹是墓葬和青瓷窑址，但也有少数的城址和佛教遗迹。

墓葬 发现地点较为普遍，但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差异大，所以

地方特点比中原地区突出，依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不同，可分长江中下游、闽广和川滇三区。其中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墓葬资料多，系统清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长江中下游墓葬一般分四期：第一期为东汉末至吴初（即3世纪初至3世纪中）；第二期为吴中期至东晋初（即3世纪中至4世纪初）；第三期为东晋至刘宋（即4世纪初至5世纪中）；第四期为齐、梁、陈三朝（即5世纪中至6世纪）。

第一期：大型墓中，后室分左右两室、前室附有耳室的券顶砖墓较多。中型墓前设甬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墓较多。大中型墓随葬品多陶器，有少量青瓷器，器类有形体扁宽的罐、盘口壶、熏和五联罐式谷仓、茧形虎子；有漆器、铜器和铁兵器；还多随葬地券和五铢铜钱。小型墓有长方形砖室和土圜两种，随葬品只有陶器和少量五铢钱。这一期墓葬与当地东汉晚期墓葬差别不大，表明孙吴初期东汉旧制还没有较大的改变。

第二期：墓葬的地方特征显著。大型墓多前附甬道的前后室砖墓。中型墓多前附甬道的长方形单室砖墓。大中型墓室顶出现四隅券进式的穹隆顶，有的墓室两壁向外砌出弧线，墓壁有的设有灯台或砌出灯龕，墓室出现了排水沟、砖棺床和砖榻。随葬器物中青瓷器的数量、种类增多，釉色复杂化。出现褐色斑饰、褐色彩绘，甚至还出现褐色釉。新出现的器形有一盘二耳杯的组合、扁壶（柙）、多子盒（槁）、三熊足砚、动物形插器、唾盂和较多的模型明器；流行堆塑阙楼人物的谷仓罐、球形熏和附有兽足的茧形虎子。较晚又出现了鸡首壶和球形虎子，还出现了陶牛车、陶马和陶俑。此外，棺内多葬金银饰品，有的出有玉佩珠饰，表明墓主人原是衣朝服入殓的。大中型墓最具典型性的是江苏宜兴西晋周氏墓群。小型墓较前阶段变化不大，出现了甬道偏置一侧的作法，随葬品中也有了少量瓷器，如罐、碗之类。

湖南长沙发现的西晋晚期的中型墓多随葬陶俑，有侍俑、属吏俑，更多的是武装仪仗俑，这大约是当时地方豪强势力强大的一种反映。

第三期：南京发现多处南迁大族的墓群，如南京北郊象山、郭家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和南郊戚家山谢鲲墓等。这类大族墓葬多为大中型墓。墓的形制有如前阶段的前后室砖墓；也有新流行的接近方形的单室砖墓和长甬道的单室砖墓；还有甬道前端作出类似小室的所谓吕字形砖墓。墓壁有的除砌灯龕外，还砌出棂窗。壁砖多有纪年铭，纹饰逐渐复杂。大约在这阶段的晚期，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人物画像砖。随葬瓷器减少，罐壶瓶类向瘦高发展，以凭几为中心的榻上用具逐渐成组。鸡首壶流行，耳杯两端上翘，槁多作圆形。新出现碗托、三足炉和六蹄足砚。器物上流行用莲花纹饰。墓志数量增多。较晚墓中出现了宋铸的四铢铜钱。南京发现的大中型东晋墓中，至少有四座出土了推测为罗马制造的玻璃器，其中一座还同出嵌有金刚石的金指环。这类西方高级品的出土，为东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证。

第四期：在丹阳胡桥和南京甘家巷、西善桥等地发现的墓，为墓壁砌出弧线的长方形单室、前设长甬道的大型砖墓，大约是齐梁时期的皇室陵墓。这种墓的墓室前方一般砌有较长的排水沟通向水塘，地面上一般都布置石兽、石柱、石碑等石刻。这种大型墓可分为两类：一类墓室全长在 13 米以上，长甬道内设石门两重，如被推定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的一座和被推测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的一座（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另一类墓室全长在 9 米以上，设一重石门，如甘家巷梁桂阳王萧融墓。这种墓的墓壁，较早的流行较大面积的拼砌画像砖，题材除竹林七贤、荣启期外，还有羽人、龙、虎和鼓吹骑从的内容，如胡桥诸齐陵；较晚的则仅用莲花忍冬花纹砖，如甘家巷萧融等墓。使用莲花忍冬花纹砖的墓，有的还在甬道壁面拼砌出蹲狮形象，如前述陈顼的显宁陵。常州戚家村发现的画像砖墓，也应属于这阶段晚期的遗迹。这种大型墓都遭到严重的破坏，随葬品残存较多的是石制器物，有石榻、帷帐石趺、石凭几、石俑等，也有少量的陶俑、漆器、陶瓷器和玉佩玉玦等。中型墓则无石门，全长皆在 6 米以下，墓室多长方形和“吕”字形，砖多素面无纹饰，但随葬品一般保存较好，瓷器如罐、壶、瓶、唾盂等都更向修长发展，新出现的器物有装饰繁缛的莲花尊，一盒五盏的组合器、粉盒、细颈瓶、高足盘和六至八滴形足砚。晚期的墓葬中出现陈铸的太货六铢铜钱。

河南南部邻近湖北的邓县画像砖墓，出土了一块书有“在吴郡”字样的墓砖，可以大致推定它属于南方地区这阶段的墓葬。548 年，侯景乱梁以后，襄阳及其以北地带，即已隶属北朝，因此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晚于本阶段的中期。该墓画像砖中表现的丧葬习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态以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种类和造型，都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内容和形象极为相似。反映出齐梁时期宛洛一带和汉水一线，不仅是南北时有军事冲突的区域，同时又是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学习的重要地区。

闽广墓葬 福建两广地理毗邻，各方面的联系密切，吴晋南朝墓葬的情况也较接近。两地发现较早的六朝墓多属西晋晚期；东晋以后的墓葬数量多，分布的区域逐渐扩大。墓室结构除与长江中下游类似的小型砖墓和前建甬道的中型砖墓外，两地都有在墓室内加砌砖柱的作法。广州的两墓或三墓连建，广西北部在墓室后部加砌高台，广州、梧州永嘉末年墓使用的“广州皆平康”、“江南尚康平”铭文砖等，应是两广地区的地方特点。随葬器物形制的变化，除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鸡首壶、唾壶、钵、碗、砚等陶瓷器外，福州、南安六朝晚期墓多出青瓷插器、子母盏盘和动物形虎子，苍梧晋墓所出仪仗俑，融安齐梁墓所出滑石明器，建瓯梁墓和广州六朝晚期墓所出附有女厨俑的陶灶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些墓葬在结构和随葬品方面的特点，有不少与闽广相邻的赣湘两地的六朝墓有一定联系。此外，英德、曲江的齐墓中，发现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9～484 年）所铸的银币，反映出 5 世纪后期经南海溯北江北上的这条交通路线的繁荣。

川黔滇墓葬 四川、贵州、云南发现的蜀晋南朝墓葬的地点颇为分散，较重要的有自

四川成都附近南迄西昌一带的砖室墓、广元绵阳的崖墓、贵州清镇和平坝的石板墓、云南姚安砖石合砌墓和昭通的石室墓。

成都、西昌发现的砖室墓多中小型长方形单室墓，早期有少数长9米以上的大型多室墓。随葬品蜀汉时多存汉制，有一般陶器和陶俑、水田明器以及少量铜器；彭县墓中还嵌有各种生产内容的画像砖，彭县、西昌墓中还有君车出行砖。广元绵阳间崖墓多长方形单室，也有并列墓室前附同一前室的。蜀汉时期墓多陶器，晋墓瓷器增多，有盘口壶、钵、唾壶等；南朝墓瓷器种类和形态的变化与长江中下游墓相似。

贵州清镇、平坝多小型石板墓，蜀汉西晋墓的随葬品与四川接近，东晋以后的随葬器物多与两广近似。

云南的发现集中在当时云南郡治的姚安和朱提郡治的昭通。姚安发现的咸宁四年（278年）大中大夫李某砖石合砌的大型墓，随葬品有具地方特点的附把陶杯和绳纹陶仓；也有和四川蜀汉墓所出相似的铜釜、陶甗和铜镬斗。昭通发现的盩顶方形壁画石室墓，墓内有墨书题记，此墓形制和部分壁画内容与两晋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大中型墓颇为类似。

青瓷窑址 吴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青瓷窑址，多分布在浙江和江苏靠近浙江的个别地点。

浙江青瓷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所谓龙窑。上虞鞍山吴窑保存完整，全长13.32米，宽2.1~2.4米，由前部半圆形火膛、中部长10.29米有倾斜度的券顶窑床和后部6个排烟孔所组成。上虞帐子山发现的晋代残窑，窑床内保存的窑具自前向后排列有序。这个现象表明该窑已充分利用了窑床后部，因而有人推测当时有可能解决了龙窑分段烧成的问题。所以，丽水吕布坑发现的南朝窑已向装烧面积加大、窑室券顶跨度缩小的窄长形式发展。中国南方系统的窑室——龙窑，从南朝时期就开始走向定型化。

南邻浙江的江苏宜兴丁蜀镇一带，发现多处西晋时期的长形瓷窑址，出土的窑具有柱状、覆盆状的窑座和齿口钵状的窑垫。烧造的碗、钵、洗、罐等，多压印网纹装饰带，因此有人认为宜兴周氏墓群随葬的有网纹带饰的青瓷器即是这里的产品。丁蜀镇东北的大浦，是太湖西岸的重要港口，附近曾发现满盛丁蜀均山所烧青瓷器的沉船，可见这里的产品当时还大量向外地输出。

城址 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都城建业——建康城和湖北鄂城的吴王城。

建康城在地面上几无遗存，过去有人拟建康宫城位于南京工学院西侧进香河和东侧珍珠河之间。南京工学院曾多次发现莲花瓦当和唐以前琉璃瓦件，推测是东晋以来宫廷建筑的遗物。近年于明代钟阜门西发现明内城城墙下压有一段较早的夯土城垣，有人估计这是南朝建康城北垣的遗迹。从这些零散资料，还难以推测建康城的轮廓。

吴王城即魏黄初元年（220年）孙权始都的武昌城，其遗址在今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墙夯筑，平面略作矩形。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现存长度约600米，北垣约已沦

入长江中，南垣和东垣南段保存较好，墙基宽十余米，夯层中杂有大量汉代灰色绳纹陶片。城内北部原似有子城，约是武昌宫的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郭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再西为武昌港口樊口。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六朝时期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佛教遗存 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有零散出土的有关遗物和少量的寺院遗迹。

长江中下游自吴末迄东晋的墓葬中，多出附有佛像的器物。现知最早的一件是湖北武汉市永安五年（262年）墓所出镂雕立佛的鎏金带饰。其次有浙江武义、湖北鄂城、湖南长沙等地吴末西晋初墓出土的有坐佛形象的夔凤镜。再次是长江中下游和浙江等地两晋墓中随葬的谷仓罐上出现的佛像。这阶段的佛像，从其所在位置和造型等方面推测，与此后单独雕铸作为供养的佛像意义不同。南方单独雕铸的佛像，现存最早的是刘宋遗物，有四川成都出土的元嘉二年（425年）净土变石刻和传世元嘉十四年（437年）、二十八年（451年）两件释迦鎏金铜坐像。刘宋造像较同时和稍后的中原北方造像为清秀。南朝清秀型造像大约到5世纪末向庄重端雅发展，四川茂汶所出齐永明元年（483年）无量寿佛和弥勒佛石刻可以为例。

南方开窟凿像之风远逊于北朝。南京摄山（栖霞山）齐永明二年迄梁天监十年（484~511年）营造的无量寿佛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永明四年（486年）创建、天监十五年（516年）竣工的弥勒佛，是仅知的两处南朝大龕。两大龕原皆前接木建殿阁。主像和外观均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有别。南方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龕，但已发现的寺院遗迹甚少，较重要的一处是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该地先后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萧梁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武帝孙益州刺史萧范所造螺发、着通肩大衣的释迦立像，可以视作南朝后期佛像的典型。梁像中有较多的形象组合复杂的造像石龕，有的龕背镌刻祈求往生西方无量寿国的铭文。南朝佛教造像突出无量寿佛和弥勒佛，反映出人们对西方净土的祈求和对弥勒成佛后世间安宁的向往。这和当时中原北方重禅观，着意于自身的解脱，因而流行雕塑释迦和弥勒菩萨等形象有所不同。四川广元古栈道的崖面上多凿窟龕，较早的窟龕造像与中原北魏晚期石窟类似。皇泽寺第9窟最具代表性，窟形和造像题材与巩县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塔庙窟极为接近，所以，这里的窟龕造像应属中原地区的系统，与江浙一带南方地区的窟龕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指辽河以东，鸭绿江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考古发现有魏晋十六国墓葬和高句丽遗迹。

魏晋十六国墓葬 北自沈阳，南迄旅大，都发现了魏晋时期的墓葬。辽阳以北多砖室墓，辽阳附近多石板墓，旅大地区多小石板墓。

辽阳是平州和辽东郡治所在，附近多平顶石板墓，类型复杂。有砌出前中后三室的较大型墓；有砌出前后两室的中型墓；也有只具棺室的小型墓。前两种有壁画，前室左右都各砌一大一小的耳室，大耳室壁绘墓主人饮宴，小耳室壁绘庖厨、马厩；砌出三室的，其后室壁绘庭院楼阁，前中室壁画无存，按当时汉末壁画之例，推知前室壁绘伎乐百戏，中室壁绘墓主人出行。小型墓无壁画。三类墓共出的器物，多装饰品，有钗、环、镯和两端作叉形的铜饰件；陶器多粗厚的罐、钵；还有两端上翘的石灰枕。大中型墓有陶明器如井、灶、俎和圆案、耳杯、豆、长颈瓶等。三道壕发现的一座小型墓中，曾出有太康二年（281年）纪年铭的瓦当。上王家村一座较晚的前后两室墓，前室砌出抹角叠砌式的石板平顶；耳室壁绘墓主人右手执麈尾，端坐于后列曲屏的方榻上，方榻上绘顶饰莲花的朱帐；随葬器物有陶盘、铁镜和南方地区烧造的青瓷虎子，这座墓的时间大约已晚到十六国时期。

沈阳东郊发现的券顶砖室墓有前后两室和三室连建两种，随葬器物中有辽阳石板墓中常见的石灰枕和两端作叉形的铜饰件，后者也常见于中原晋墓，常见于中原晋墓的还有釉陶小罐、位至三公镜、铁镜和盒、奁等漆器。

旅大营城子小石板墓多叠涩收顶，石板间用贝壳灰粘合，有前后两室和后室分砌左右室两种，随葬品多陶器，有罐、长颈瓶、圆案、耳杯和井、灶、俎、仓之类的明器，还有少量铜镜和剪轮五铢铜钱。

高句丽遗迹 主要遗迹分布在长白山脉南段以南，以桓仁为中心的浑江流域和以集安为中心的鸭绿江北岸。长白山脉以北多高句丽晚期遗迹。高句丽遗迹可分城址、墓葬两大类。

城址 有山城址与平原城址两种。山城多因山势修建，形制不规整，桓仁五女山城可能是高句丽较早的城址。该城西连悬崖，东、南、北三面城垣皆以自然石板堆砌。209年，高句丽迁都丸都，即今集安县城西北的山城子山城。该城内外侧皆垒砌经过人工修治整齐的长方形巨大石块，内低外高，中填河卵石，城平面略做椭圆形，周12里。在集安北面通向辽东的两处关隘附近的山上，都发现了城址，这显然是卫护都城的山城。散布在长白山脉西北侧，南自金县沿海的大和尚山城，东北经复县、辽阳、抚顺、西丰、辽源等地，以迄吉林龙潭山城一线的山城和在长白山南麓南通平壤的要冲凤城东南发现的乌骨城址，都是4至5世纪以后，高句丽晚期山城的遗迹。

平原城址发现较少。集安山城子山城东南的国内城址，是典型的一处。今集安县城即因国内城修建，县城北垣犹存当时的规整的石垣。该城略作方形，每面里余，城内中部以北多出础石、兽面或莲花纹瓦当和残瓦，可能是高句丽王室建筑的遗迹。城东郊发现的出有石础、瓦当和各种残瓦的大型建筑址，大约也是王室建筑的遗存。

墓葬 高句丽墓葬一般建在地面上，有积石墓和壁画石室墓两种。桓仁地区的积石墓